

孫文と一井財閥



孫文與三井財閥

洪聖斐／著

孫文與三井財閥／洪聖斐著，--初版--臺北市：

文英堂，1998〔民87〕

面： 公分--（中日關係系列：4）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8811-10-1 (平裝)

1. 中國－歷史－民國（1912- ）

628

87001995

孫文與三井財閥

著 者：洪 聖 斐

發 行 者：文英堂出版社

發 行 人：許 瑞 瑛

地 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五十六號六樓之一

電 話：(02) 23658753

傳 真：(02) 23633901

郵撥帳號：17237788

總 經 銷：永續圖書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三〇二巷三十四號二樓

電 話：(02) 6418979

傳 真：(02) 6437732

印 刷：先鋒打字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一九九八年三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定 價：單本新台幣200元

『孫文與三井財閥』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一

第二章 借款的主體：明治維新後的三井財閥

一一

第一節 明治維新的「殖產興業」政策

一一

第二節 三井財閥急速膨脹的時代背景

一八

第三節 三井財閥與日本官僚及軍部之關係

二八

第三章 三井借款的前因：日本在中國的利益

三九

第一節 漢冶萍公司

三九

第二節 中國東北

五四

第四章 三井財閥於辛亥革命期間對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援助

六七

第一節 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窘境

六七

第二節	日本朝野對中國革命的態度	七六
第三節	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	九三
第四節	中國東北租借問題	一〇六
第五節	三井借款條件落空與「二十一條款」	一一二
第五章 結 論		
參考文獻		
年 表		
附錄一		
附錄二		

第一章 導論

日本三井財閥在辛亥革命時，曾先後提供南京臨時政府至少二、四五〇、〇〇〇日圓充作革命軍費。這筆錢相當於一九一一年三井物產會社在國外貿易總額三五、四七九、〇〇〇日圓的六・九%，實在不是一筆小數目①。如此鉅款不投資在第二年的再生產，而去支援外國人搞革命，其理安在？

一般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都同意並假定成功的經濟人是理性的（*rational*），而不太會受到浪漫情感的左右。三井財閥是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第一大財閥②，據評估其財勢超過排名第二的三菱財閥約有三倍以上③。在日俄戰爭之後一段期間，僅僅三井財閥旗下三井物產會社一家的貿易額，就佔了當時全日本總貿易額的二〇%有餘④。可想而知，這種財閥對於投資事業的風險，應該有相當強的理性評估能力，不會浪費金錢於無謂之事。而軍費耗散甚為迅速，革命事業的成敗風險至為鉅大，一旦失敗不但所有投資盡化為幻夢泡影，且必被清廷視為極度不友好的行為而有遭受抵制乃至報復的危險。到底是什麼誘因，令三井財閥願意冒如此鉅大的風險，提供鉅額軍費援助南方臨時政府呢？

眾所周知，日本企業自明治維新以來就與日本政府關係十分緊密，無視、乃至違背政府

政策而獨行其是，即使は號稱日本財界第一大集團の三井財閥也是難上加難的。當時的日本政府並不同情中國革命，為何會容許三井財閥提供鉅款支持南京臨時政府呢？

而日本軍部對政壇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在中國發生辛亥革命時，日本軍部最關切的問題，是如何藉此良機揮軍中國。三井財閥經援中國革命勢力，對日本軍部的計劃有何影響？軍部的態度如何？

而一般研究指出，明治維新前後所產生的日本右翼團體之中，不乏支持中國革命者。他們在此事中又扮演何種角色呢？

一言以蔽之，辛亥革命期間，三井財閥提供南京臨時政府鉅額借款，與當時日本政府、軍部、右翼團體的立場與行為必然有所關聯。日本朝野各界介入中國革命，所為何來？換句話說，他們的目的為何？希望藉此得到什麼利益？日本政府、軍部、右翼團體面對中國爆發革命的態度又如何影響到三井財閥的借款行為？

另外，接受三井財閥鉅額借款的南京臨時政府，對於日本朝野的態度與目的是否清楚？又有何因應之道呢？

這一連串的問題，乃形成筆者撰寫本書的動機。

研究目的

至於本書的寫作目的，乃企圖透過分析三井財閥借款的前因後果，掌握財閥在近代日本

對外擴張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研究這一段歷史時，有幾個關鍵問題特別值得注意：

首先，三井財閥固然早在德川幕府初期即已存在，但成為近代化企業集團卻是在明治維新之後。隨著日本轉型為近代帝國主義，積極向外擴張，三井財閥也日益壯大。三井財閥與近代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如何，值得深究。

其次，三井財閥與其他幾股推動近代日本帝國主義的主要力量，如官僚、軍部、和大陸浪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必然會影響到三井財閥實際參與幾次向外擴張的舉動。

第三，三井財閥在清末，日本帝國向中國擴張勢力範圍時，扮演何種角色？取得何種利益？素來相關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多半側重官僚、軍部和大陸浪人的活動，對於財閥的利益則著墨不多。

第四，日本官僚、軍部、大陸浪人對辛亥革命的態度如何？三井財閥借款援助中國革命之舉，與這些勢力的關聯為何？日本想藉此得到什麼利益？三井財閥又有何企圖？

第五，對於三井財閥等日本勢力的攻勢，南方的革命軍和北方的袁世凱有何反應？英國等在華有重大利益的列強又有何反應？

最後，革命軍與袁世凱在英國的協調下議和後，導致三井財閥借款條件落空，與爾後日本的對華政策有何關聯？三井財閥在這些政策的形成過程中又扮演何種角色？

前人的研究

本論文企圖透過對以上這些問題的整理，尋找財閥與近代化國家之間的共生關係。國內外有關辛亥革命期間，日本財閥對革命黨人借款的研究，比較具有代表性者有下列幾家：

一、林明德「民初日本對華政策之探討（一九一—一九一五）」^⑤

林文指出，日本各界對於辛亥革命的態度並不一致，但此時有一共同看法，即認定中國的動亂實為日本千載難逢的時機，必需善加利用。武昌起義後，西園寺內閣的對華基本政策是援助清室及袁世凱，伺機擴張在華利益，甚至解決「滿蒙問題」。在受阻於英國，並為袁氏所愚弄之後，西園寺內閣轉而支持革命黨以與北京袁政權對抗，形成兩面外交。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日本政府採取行動，企圖奪取中國長江流域利權，乃透過「大倉組」、「三井物產」貸款供給革命軍軍火，而以中國之招商局、蘇省鐵路公司、以及漢治萍公司為擔保。這些企圖後來在英國和袁世凱的阻撓下失敗。

林文大致說明了當時日本借款的動機，但對於借款的過程、日本財閥與國家之間的關聯，以及南方臨時政府的反應等，全然沒有交代，失之簡略。

二、彭澤周（現改名為伊原澤周）『近代中日關係研究論集』^⑥。

彭書「漢治萍公司與日本的初期關係」、「辛亥革命與漢治萍公司」、「辛亥革命與日

本西園寺內閣」等文，就日本長期以來對漢治萍公司等華南利權的覬覦、以及三井借款的過程有較詳細的討論。彭書指出，日本政府為了對付袁世凱才支持革命黨，為的是要中國南北相抗，好從中混水摸魚。援助革命黨的方法是販售軍火及有條件的借款給革命軍。為此，日本財閥乃誘迫革命軍借外債。

然而彭文並未交代日本政府如何指令日本財閥借款，對革命軍方面又以「中山先生對日本軍閥的陰謀看得很清楚，向日本借外債的計劃決不是出自他的内心。當時革命黨的一部份重要幹部多為日本浪人所包圍，這些日本浪人的意見都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影響革命黨的決策，日本軍閥及財閥通過浪人誘迫革命黨內的重要幹部如黃興、宋教仁等，然後再直接或間接地左右中山先生的意見，這或也是革命黨決定向日本借外債的另一原因」簡單帶過（該書頁四一一）。不僅對革命軍的決策過程描寫的太過馬虎，該段文字中所提到的日本浪人的角色也未能加以解釋。

三、謝國興「民初漢治萍公司所有權歸屬問題（一九一二—一九一五）」^①

謝文對漢治萍公司從清光緒年間創辦到民國四年「二十一條款」的歷史有相當清楚的交代，尤其是該公司於民初的產權問題。謝文的貢獻是對南京臨時大總統孫文和陸軍總長黃興，在中日合辦風波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相當詳細的討論。這一點在國內其他學者的文章中是看不到的。

可惜的是，謝文的討論焦點主要集中在國內，對於日本方面的活動則未多加著墨。一九〇四年，漢冶萍公司向日本興業銀行借款三百萬日圓，幕後有三井財閥的活動^⑧。辛亥革命期間，日方如何以「舉國一致」的戰略來推動「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凡此，都是謝文未處理的重要問題。

四、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⑨ 「辛亥革命時期の孫文關係資料——『滿州問題』をめぐる森恪書簡——」^⑩ 「孫文の對日態度——辛亥革命期間の『滿州』租借問題を中心に——」^⑪、「孫文と『滿州』問題」^⑫、「二十一カ條交渉時期の孫文と『中日盟約』」^⑬、「孫文と日本・東アジア」^⑭。

日籍學者藤井昇三的研究重點，主要在孫文與日方的借款交涉過程。其研究最主要特色，在於掌握了三井文庫中許多不為人知的祕密文件，諸如日本明治、大正朝元老政治家井上馨家所提供的文件、往來書信等史料，對於吾人瞭解當年實際借款情形有相當大的幫助。例如「辛亥革命時期の孫文關係資料——『滿州問題』をめぐる森恪書簡——」中，就披露當年桂太郎曾透過三井財團總顧問益田孝，訓令三井職員森恪向孫文提出租借中國東北的要求等秘辛。

然而藤井昇三也有很嚴重的問題，就是他迴避了在借款的背後，日方朝野各股勢力的態度和謀略。就其所掌握的資料，應可以勾勒出日方謀劃的藍圖。藤井氏捨此不為，使其研究

產生相當的疏漏。

五、信夫清三郎「中國革命的衝擊」⁽¹⁵⁾。

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近代政治史』第四卷第二章「中國革命的衝擊」中，曾對借款問題加以檢討。他指出，漢冶萍公司的大冶鐵礦是日本帝國主義最大的原料補給基地，早在一九〇五年桂太郎內閣即以決定要將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視時機使之全然歸於我國之手」（頁七九），一九一〇年日本政府確定了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的方針而展開交涉，即面臨辛亥革命爆發。

西園寺內閣原本希望中國出現由滿漢兩族所構成的君主立憲政體，但在英國反對從外部干涉的情形下而束手無策。於是各股勢力紛紛冒出，元老山縣有朋力主出兵中國東北，西園寺內閣並不同意。大陸浪人則各自行動。朝野各集團對辛亥革命的態度各不相同，導致日本政策分裂。內相原敬遂趁機將外交主導權從首相和外相手中奪取過來，而決定：「對革命軍應採取較前略進一步而形成援助關係之政策。還有，如果俄國已藉幫助外蒙古自治之名義下手，對我而言，此亦對東三省下手之時機（頁八三—八四）」。於是對革命軍提供資金援助，以期確立在中國本部之優勢地位；並與俄國協議，共同瓜分滿蒙。但這兩點都在英國的阻撓和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反彈下，宣告失敗。

信夫清三郎清楚交代了日本援助辛亥革命的動機，但是對執行的機構：三井財閥為何聽

命行事未曾加以解釋。此外，大陸浪人在這項借款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未被重視。

六、李廷江『日本財界與辛亥革命』¹⁶

李著以其博士論文改寫而成，主題放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起，到辛亥革命後的一九一四年為止，二十年間日本財界與近代中國的經濟關係史，而辛亥革命是其高峰。除了時間很長外，李著的關照面也很廣，他最關心的對象，是日本的整個財界。就作者本人自己的界定，日本的財界是由「經濟界、金融界、產業界、實業界」組成的大資本家集團，是「對政治社會、經濟社會」具有舉足輕重的大資本家集團（該書頁三）。三井財閥雖為日本財界中最龐大的集團，但並不是李著的重點所在。因此，三井財閥在辛亥革命期間對南京臨時的借款，在李著中也只佔短短一個小節的篇幅。

李廷江認為「就政治而言，財界與政府關係密切，是可以左右日本內外政策的政治集團。此外，作為鉅額政治資金的提供者，財界又能從更高的層次上影響政治，甚至被稱為『第二個政府』（該書頁三）」。這是過於高估日本財界的影響力。事實上，日本近代的工業化過程，是政府起頭，由上而下發動的。日本財界與官方的關係甚為緊密，這固然毋庸置疑，然而要說日本財界有「左右」政局的能力，甚至是「第二個政府」，卻與事實相去甚遠。

由於李廷江過度高估日本財界的主動性，使其在研究日本財界與辛亥革命的關係時，過於忽略日本政府在幕後所扮演的角色，是這本書相當嚴重的缺點。

七、小結

整理以上各家說法之後，吾人發現，這些研究雖然都對辛亥革命期間日本政府透過三井等財閥借款給革命軍的事實，有相當篇幅的討論，可惜都只偏重某些部分，未曾追究前因後果，做過完整的檢討。尤其是黑龍會的內田良平曾於辛亥革命爆發後，致函三井總顧問益田孝，希望三井在援助清廷之餘，同時也援助革命軍¹¹。這項舉動，在前面幾篇文章中，都找不到合理的解釋。後學不敏，願以初生之犢的勇氣，嘗試此一艱鉅之任務。

- ①：參考財團法人三井文庫『三井事業史』第三卷上（東京：財團法人三井文庫一九八〇年），頁五八。
- ②：高橋龜吉『日本財閥の剖析』（東京：中央公論社，一九三〇年），頁四九。
- ③：岩井良太郎『三菱コンツエルン讀本』（東京：春秋社，一九三七年），頁四。
- ④：財團法人三井文庫『三井事業史』第三卷上，（東京：財團法人三井文庫，一九八〇年），頁五九。
- ⑤：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頁四一三—四五九。
- ⑥：彭澤周『近代中日關係研究論集』（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七八年）。
- ⑦：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期，頁一九三—二三七。
- ⑧：加藤幸三郎『三井財閥的形成和日本帝國主義』，收錄於高橋幸八郎編『日本近代化的研究』下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頁二八五。
- ⑨：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發展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勁草書房，一九六六年）。
- ⑩：收錄於アジア經濟研究所『戰前日本の中國研究』第四期（東京：アジア經濟研究所，一九八三年）。

⑪：收錄於『石川忠雄教授還暦記念論文集——現代中國と世界——その政治的展開』（東京：慶應通信，一九八二年），頁一〇九——一五〇。

⑫：一九八六年一月五日～九日，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主辦「孫中山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⑬：市古教授退官紀念論叢編輯委員會『論集·近代中國研究』山川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三三五—三五九。

⑭：收錄於中村義編『新しい東アジア像の研究』（東京：三省堂，一九九五年），頁四三—六八。

⑮：收錄於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近代政治史第四卷——走向大東亞戰爭的道路』（臺北：桂冠圖書公司，一九九〇年），第二章，頁七三—一三〇。

⑯：李廷江『日本財界與辛亥革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⑰：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卷（東京：黑龍會出版部，一九三六年），頁四四五—四四六。

第二章 借款的主體：

明治維新後的三井財閥

第一節 明治維新的「殖產興業」政策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朝野為追求與歐美各強國並駕齊驅，將政治、社會、經濟等結構徹底加以調整，其精義乃在「殖產興業」與「富國強兵」。

日本歷史學者石井孝在其『日本開國史』中，把日本開國的過程視為日本被納入世界資本體系的過程：「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為核心，在它的周圍還有晚些時候才確立資本主義國民經濟的美、德、法等國家，因而形成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在它的下面，則有作為世界資本主義商品銷售市場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經濟上的附屬國。這就是我（日本）國開國時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結構。日本的開國，意味著日本被納入到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之中①。」

十九世紀，隨著西方殖民帝國的勢力擴張，東方的中國與日本同受其擾，先後被要求開放市場、通商貿易。由於中國腹地較大，成為西方殖民地國覬覦的焦點，遭受侵伐較早，被

掠奪也較多，其經驗恰好可以提供日本參考。

中國在鴉片戰爭後一敗塗地，給予日本朝野相當大的刺激。西方文明的船堅砲利，擊敗了東方文明的華夷秩序。這一點使日本社會中，學習西方文明的意見日漸成為主流。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九日，日本朝廷宣布「王政復古」，將執政權從德川幕府收歸朝廷所有。一八六八年，朝廷在與幕府的內戰中獲勝，改年號為明治元年，並將原幕府所在地江戶改為東京，開始一連串的西化改革。

早在一八六八年三月，日本明治朝廷與幕府軍對峙於江戶城之際，朝廷即提出「五條國是誓文②」，作為改革方針，其中有「求知識於四海，大振皇基」。明治朝廷戰勝幕府後，一方面為了考察歐美各國富強的原因作為日本新政府治國方略的借鏡，另一方面希望與各國修改前此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乃於一八七一年十一月，派遣右大臣岩倉具視率領副使木戸孝允（內閣顧問兼參議）、大久保利通（參議兼大藏卿）、伊藤博文（參議兼工部大輔）、山口尚芳（外務少輔），以及實際負責政府各部門事務的菁英五十人，組成龐大的使節團前往歐美考察。以「大不列顛和平」（Pax Britannicae）於十九世紀稱霸世界的英國，自然是考察的重點之一。

一八七二年八月到十二月，使節團停留在英國達四個月之久，遍訪倫敦、樸茲茅斯、利物浦、曼徹斯特、格拉斯哥、愛丁堡、伯明罕等工業重鎮，從而認知到，歐美文明的原動力，